

# 文学的历史客观性与伦理阐释

## ——论《指环与书》的多角度叙事

田 平

**内容提要** 文学伦理学批评就在于文学的历史客观性,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历史学对待历史客观性的不同态度对文学创作有借鉴作用,恰当地运用这些方法会极大地提升文学的历史客观性,有助于创建伦理现场和环境,实施伦理阐释和批评。英国诗人罗伯特·布朗宁的《指环与书》的多角度叙事正是充分利用了历史学中对待历史客观性的不同态度,极大地提升了文学的历史客观性,为伦理阐释创造了必要的历史环境。

**关键词** 历史客观性 文学的历史客观性 罗伯特·布朗宁 《指环与书》 伦理阐释

田 平,巢湖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238000

文学伦理学批评就在于它的历史客观性,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即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客观的伦理环境或历史环境是理解、阐释和评价文学的基础<sup>[1]</sup>。这使我们认识到,文学的历史客观性是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认识和把握文学的历史客观性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关键,这为我们解读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1812-1889)的代表作《指环与书》(The Ring and the Book<sup>[2]</sup>,下文简为《指》)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

《指》全诗21,116行,分为12部(Book I-Book XII):Book I(简为BI,Book II简为BII……)叙述了诗人在罗马地摊上发现一本《旧黄书》(The Old Yellow Book<sup>[3]</sup>),里面是关于罗马1698年一起老夫杀死少妻案件的法律文书,与之在一起的还有几封关于这个事件的信件;BII-BXI里,案件中的直接人物、有关人物和非相关人物以戏剧独白的形式说明、阐释、判断案件;BXII又改用诗人之口,叙述案件审判的余波,结束全诗。自该诗出版以来,学界一直将其多角度叙事现象与真实(truth)主题相联系<sup>[4]</sup>。本文

[1]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武汉〕《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

[2]Robert Browning, The Ring and the Book. eBooks@Adelaide,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Library, 25. Aug. 2015.

[3]The Old Yellow Book: Source of Robert Browning's The Ring and the Book, <trans. And ed by Charles W. Hodel>,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INC, 1911.

[4]Stefan Hawlin, The Complete Critical Guide to Robert Brown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191-200.

希望借助历史客观性概念来论述《指》的这种多角度叙事方式,并进而阐释其以此方式获得并提升文学的历史客观性,为伦理阐释创造历史现实条件的客观效果。

## —

从19世纪至今,历史学家对历史客观性的认识和理解一直见仁见智,概括地说,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历史客观性应该尊重客观史实摒弃人的主观因素,“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广泛地搜集档案材料,然后对此做一个科学的考订。在此基础上,只要史学家摒弃个人的好恶、世界观和价值观,将这些材料连接成一个序列,就可以重建部分的乃至全部的历史真实”<sup>[1]</sup>;另一种持客观史实和人的主观因素并重的态度。认为历史客观性只是一种理想,实际上“每一个历史学家对于实际发生的事都有某种洞见,因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过去都是按他的观点被显示出来的”<sup>[2]</sup>;第三种轻客观史实、重人的主观因素。此观点认为,历史自发生后就离开了,历史的客观性也随之离开,我们所读的历史是一种“文本化”、“共文本化”、“再共文本化”和“交互文本化”<sup>[3]</sup>的历史,历史只不过是文学的文本,历史无须忠实过去。

了解了历史学家对历史客观性认识的演变,那么又当如何理解文学的历史客观性?它关乎历史,这就意味着作家创作和叙述要考虑历史客观性,这是文学家与历史学家相同的地方;但它又关乎文学,这意味着创作和叙述时必然与自己的语境融合在一起,这是文学家与历史学家不同的地方。历史客观性是文学的历史客观性的根据和前提,是文学的历史客观性和伦理阐释的必要条件,这是对文学的历史客观性的客观要求。文学的历史客观性又是文学的,它强调自身的文学特质,即强调主观因素在文学叙事作品创作和理解中的不可或缺,强调与历史现实一致的主观现实,强调主观想象在历史生产中的创造作用,强调人的思维和认知逻辑在连接历史与史实中的纽带作用。主观因素同样是文学的历史客观性和伦理阐释的必要条件,这也是对文学的历史客观性的客观要求。

以此对历史客观性的认识来看《指环与书》就会发现,此作品较好地揉合了对历史客观性的不同态度,在叙事过程中针对不同的对象采用了不同的书写方式,最大程度地接近了客观历史,而又彰显了作家的主观能动和伦理阐释。

## 二

重客观史实轻主观因素的写史方法是,历史学家必须客观对待历史资料,不能有主观偏见,这样写出的历史才具有历史客观性。运用于文学创作,作家必须有历史资料,自己的想法必须屏蔽,以实现文学的历史客观性,获得客观的伦理环境。在《指》的BI和BXII里,布朗宁试图重构1698年罗马那起老夫杀妻案。首先,诗人用“我”作为叙述者,把叙述者变成真实之人,使得叙述层面的虚构性具有了现实层面的真实性。第二,布朗宁有了杀妻案件的历史资料。1860年6月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市摆满摊位的圣洛伦佐广场(Book I,第92行,简为B:92,下文同),诗人用1里拉买到一本《旧黄书》(B1:38),是那起轰动一时凶杀案期间七个星期的法庭诉讼记录<sup>[4]</sup>。第三,根据这本书,诗人不带立场叙述杀人案件。BI有许多诗人的语言,描述得到《旧黄书》的真实环境,表达创作观点,但都没有对资料有

[1]贾鹏涛:《历史客观性问题的梳理及反思》,〔石家庄〕《高校社科动态》2011年第5期。

[2]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16页。

[3]Himmelfarb, Gertrude. Telling It as You Like It: Postmodernist History and the Flight from Fact. 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 London, 1997, p.162.

[4]参见The Old Yellow Book, p.x.

任何主观改动。在叙述案件审理过程和转述行刑场面以及观刑者的观感中,诗人大量地直接引用《旧黄书》<sup>[1]</sup>,避免转述产生与原文在语义上的不同。如,诗人这样再现案子审判的过程(BI:141-363)和故事:“基陀,阿热丛(the Aretine)人,/贵族世家,家道中落,/一副鹰鼻,胡子邈邈,黑发,/瘦小个,一副病样,但却精明,/年约五十,四年前/和年轻的蓬皮莉亚(Pompilia)结婚,/她貌美,生于罗马,/随他来到阿热丛(Arreco),可日子过得/非常糟糕,怎么诅咒它都不为过。/丈夫带着四个随从/跟踪妻子去罗马,那儿/就是她从阿热丛逃往的地方,平静度日,/八个月前在一个牧师护送下,/他也是阿热丛人,出身高贵,/名叫卡蓬萨奇(Caponsacchi)。妻子/在一栋城郊住宅,圣诞除夕夜/连同维欧朗特(Violante)和皮特如(Pietro),/推断是她父母,一同被捉、被杀。/老人已古稀,妻子不到十八,/一个两周婴儿的母亲,/头胎男婴,模样像基陀,/正是这个人基陀竟敢决定/并精心实施了谋杀,/然后全力奔逃,被密集追捕,/当晚与他的同伙一起被羁押。”(BI:780-804)

重客观史实的方法勾勒出案件的轮廓,我们看到了就如布朗宁从一开始对《旧黄书》标题页逐字翻译中就看到的案件主伦理结:“人们争论的焦点是/丈夫是否或何时可以杀死通奸的妻子/并免受通常的惩罚。”(BI:128-131)这个伦理结将读者带到17世纪末意大利社会的历史和伦理现场。那是个新旧伦理冲突与变革的年代,古罗马时代和中世纪的道德习惯仍有影响,并与近代开始的人文主义道德发生激烈冲突。在家庭方面,女人受到家权、父权和夫权的束缚,有人还认为妇女应该绝对屈从和依附男人,男子统治奴役妇女、虐杀妻子是他们的权利。同时,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早期思想和法律意识也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传统道德习惯和意识形成对比,保护着妇女作为人的基本权利<sup>[2]</sup>。贵族(包括没落贵族)坚持旧伦理道德,坚持他们的政治特权,而平民坚持资本主义早期的平等和自由的基本权利,经济地位上升的平民还试图依据拥有的财产,提升社会地位。

### 三

同重客观史实写史的方法一样,客观史实与主观因素并重的方法也相信客观历史事实,不过它更进一步认为,人们不仅能够再现历史,而且还能通过加入主观因素,构建历史。历史产生于残缺或破碎的历史资料和组织这些资料的主观成分之中。就文学创作而言,尽管这种方法参入人的主观成分,历史客观性降低,然文学的历史客观性却可以得到显著提高,因为叙述者的主观成分基于历史事实的一致性,基于正常的认知和思维逻辑,就好像是黏合剂和补充剂,将残缺破碎的历史资料修补粘合起来,使其看上去逼真完好。

BI中,布朗宁发现叙述中还有这么多不清楚的问题(BI:410-412),怕英国公众会笑话他,于是想把《旧黄书》中的事实与他自己的想象融合在一起,把自己活性的灵魂与那书中惰性的材料熔合起来(BI:458-475)。叙述者一边读着书中的事实,一边想象着:他到了阿热丛基陀住地,基陀妻子“陷进被关、受虐待的鸟笼”;驻足在卡斯泰尔沃(Castelnuovo)基陀夫妻和牧师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相见的地方;又到达罗马,去了蓬皮莉亚养父养母的家,想象着那晚凶杀案的细节(BI:501-697)……想着,想着,一个完整的叙事计划出现在叙述者脑中,他“要把呆板的事实再次变活”(BI:779),“让那过去的悲伤再亮相,/自行表现出来让他人去判断”(BI:824-825)。布朗宁要把自己主观想象加到《旧黄书》的

[1]当然这些直接引语是诗人由意大利语翻译成英语的。

[2]参见何立波:《古罗马妇女的婚姻生活》,〔天津〕《世界文化》2008年第3期。谭建华:《试论罗马婚姻制度的演变》,〔石家庄〕《河北法学》2007年第10期。王世军、魏茂恒:《罗马家庭制度变迁刍议》,《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这些文献有助于说明本文对17世纪末意大利社会的历史和伦理现场的简述。

事实之中<sup>[1]</sup>。诗人根据《旧黄书》中的案件,将当事人和控辩双方律师作为塑造的对象,把诗人的主观成分参入案件当事人和控辩双方律师的话语中,变成叙述者的话语,试图解开案件的主伦理结,捋出控辩双方相交的主伦理线、辅助线及其结点,也就为读者建构出看得见、基于历史事实的伦理现场,获得了文学的历史客观性。

辩方主伦理线由当事人基陀的叙述形成(Book V),以传统的罗马伦理为基础,以保护贵族名誉权为核心价值特征,旨在说明其杀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主要结点有:1. 诚信结点。买回的妻子没有尽责,她和她的养父母还竭力诋毁他的名誉,阿热丛尽人皆知她行为不端(B5: 603-621)。2. 道德结点。妻子给他戴绿帽子。他承认卡蓬萨奇和蓬皮莉亚之间的情书是他伪造的(B5: 840-847; 852),但卡蓬萨奇不尽牧师之责,与蓬皮莉亚一起居然对他和仆人施以迷药,掳走钱柜里的现金,私奔(B5: 987-997)。之前法庭就已经判处卡蓬萨奇降职发配到外埠,判处蓬皮莉亚到修道院去思过,足以证明此事是他们的错(B5:1214-1228)。3. 杀人动因结点。他故意报上蓬皮莉亚“情人”的名字,门就开了,而如果报上自己的名字,是会被拒之门外的。“我敲门,报上/名字——是预先想好的试探,/‘会直接给流浪汉开门吗?’/会给朋友、过客、医生、化缘的修士开门吗? /会给姗姗来迟的香客、既瘸又瞎的乞丐开门吗? /不会,但一个人除外。——‘给卡蓬萨奇开门!’/果然,门开了。/这时,正是在这个时候,唉,/才不幸地证明了我所担忧的事! /凭上帝起誓,我的担忧是对的!”(B5: 1628-1637)

控方主伦理线由当事人蓬皮莉亚的叙述形成(Book VII),这条伦理线以人文主义道德为基础,以人的生存权和近现代社会基本伦常为价值倾向,旨在说明其无辜,证明基陀违背人的基本良知。主要有以下结点与辩方的结点相交:1. 诚信结点。她守信没有骗婚,却受到虐待。受养母维欧朗特的摆弄成婚(B7: 376-388),养父养母嫁女儿,没兑现关于嫁妆的约定,丈夫就对她百般施虐惩罚他们(B7: 640-646)。2. 道德结点。丈夫对她恶意伤害,编造她写情书(B7: 690-691),诬陷她卖弄风骚,勾引情人(B7: 677-680)。3. 逃离的原因。她没有奸情,向卡蓬萨奇求援迫不得已。连叔子都调戏嫂子的时侯,做丈夫的哥哥却纵容许之:“…与我同住一屋的那人,哦,那个教士,/格娄拉摩教士(Canon Girolamo),我的小叔子,/正教我堕落的爱滋味是什么,/内心的邪念外表怎样表现。/他向我求爱,说他爱我,/教士他年轻无知无事可做。/而我丈夫视之却装着若无其事。”(B7: 808-814)她求大主教让她去修道院避一避,而他却冷漠拒之,说她无知(B7:752-755),说她与丈夫生活在一起是她履行契约的义务(B7:771)。她找过总督,总督还是把她推给了她丈夫(B7:1274-1281)。她还找过那老修士,他答应帮她写信给她父母,写还是没写不知道,反正状况没有改变(B7:1301-1302)。她找到丈夫的亲戚康提(Conti),康提不敢帮,提议她向卡蓬萨奇求援,说“卡蓬萨奇才是她的圣·乔治”<sup>[2]</sup>(B7:1323)。

与控方主伦理线并行不悖的另一条辅助线由卡蓬萨奇的叙述(Book VI)形成,贯串其中的是人道主义价值观,旨在说明自己承担救人的使命,这条线与基陀伦理线的道德结点相交。有以下线索:1. 与蓬皮莉亚的第一次碰面。在剧院,教友卡童(Brother Canon)轻浮地投袋糖块到她的裙摆上,然后她又躲到卡蓬萨奇身后,引她朝卡蓬萨奇投个微笑(B6:393-412)。2. 由此招引莫名的麻烦。某个晚上

[1]这样做就改变了《旧黄书》中的人物形象:“Guido is heightened in villainy and blackened with a dedicated malignity, Caponsacchi is altered from a rakish dandy to a Saint George - dashing and daring, to his own hurt, and moved by the loftiest selflessness; and Pompilia - in the source a pitiable but not particularly remarkable young, illiterate girl - is transfigured by the white radiance of perfect purity.” See: Norton B. Crowell, *The Convex Glasses - the Mind of Robert Browning*, th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68. p.183.

[2]圣·乔治是英格兰的守护神。

一个神秘的人来送信,信上说她就是被糖块砸中的那个女人蓬皮莉亚,要求他能否同样给她回个信,送信人自称是基陀的侍女,憎恨基陀,请求他回封信给她,但他拒绝了(B6:506-532)。这样的请求和拒绝反复多次,因为他有顾虑。甚至他回信说“滚吧,女妖精!你就让一个牧师诵经祷告,免受空谈幻想的折磨,如随了你的愿,就毁了我”(B6:633-635)。最后,他明知道这是基陀下的套,没办法,他还是决定去见她。3. 职责让他介入是非。见面时,他们并不熟悉,迫于求生,请求他把她带到养父母那里,“哪怕就像带条狗那样带着我”(B6:813)。卡蓬萨奇相信了她的话,答应救她(B6:881-886)。不幸的是,历尽艰难,到达罗马后还是被基陀一伙赶上,在旅馆碰见(B6:1433-1438)。“我连手指头都没碰过她,除了圣诞夜那晚,违心地,俯身抱起她到床上,恰似我们这些牧师端着圣餐碟盘那样……”(B6:1617-1620)。

还有双方律师的独白形成的两条律师伦理线,辅助各自当事人主伦理线,与对方律师伦理线相交,其核心价值倾向就是为各自当事人寻找法律支持,实现各自利益,而并非出于公平正义。

辩护律师阿奇安格里斯(Archangelis)的叙述(Book VIII)集中两点:1. 辩护的价值目的。上帝对他真好,窃喜自己能得到机会,为一个贵族提供辩护,真是机会难得(B8:75-81)。他要打败控方律师波提纽斯(Bottinius),作为儿子的生日礼物(B8:96-97)。教皇需要能人说出案件的真相,我就是那能说会道之人(B8:103-115)。2. 价值目的实现的辩护技巧。供词最糟又最好,那是连续十小时屈打成的招(B8:330-359),可以把杀人的事证明是个谜,基陀无辜,不知情,就说卡蓬萨奇实施的谋杀,基陀恰巧来到事发现场,本想原谅他有罪的妻子(B8:360-380)。如果说杀了人,谁看见的?又是怎么杀的?杀人见脏,脏在哪里(B8:1173-1180)?

控方律师波提纽斯的叙述(Book IX)表明,他思索怎样从思维逻辑上证明当事人的心理和行为更加符合公共道德:1. 他把蓬皮莉亚比作花,把基陀比作花园的花匠,花在这儿开那儿开,总比园工踩在脚底下更合适(B9:290-294)。2. 那些信是不是她写的无关紧要,那些片言只语不会有损她纯洁的名声,身处险境,唯有求助于他,还有它法吗(B9:473-481)?“我推测,这位女士/注定提供不了什么除了爱/给牧师,而牧师就是救人的人。”(B9:507-509)3. 关于给她丈夫用了药。那是为了阻止他对他们外逃的干涉(B9:621-636)。车夫作证说她与卡蓬萨奇神父在外逃的路上一直亲吻拥抱,那是伪证,除非他的眼睛长在后脑勺上。车子颠簸,头与头、面颊与面颊相碰是自然的,就像梨树上的梨与苹果树上的苹果在秋风中晃动碰到一起一样(B9:679-702)。他将昏厥过去的她抱在怀里,他只是想知道她是不是死了。他对她救的人有多同情?难以说清,同情与爱难以区分,而爱也与非理性难以区分(B9:741-756)。卡蓬萨奇那双有力的手抱着蓬皮莉亚,搂她过紧留下青紫痕印,使她免于骨折,皮肤很快就会恢复如初(B9:999-1008)。

#### 四

轻客观史实、重人的主观因素的方法,同并重这两者的方法一样,认为历史中有主观因素,不过比并重这两者的方法走得更远。极端的轻史实的方法差不多就是,少用或不用历史资料,人的主观成分就能产生历史。该方法的历史客观性很低,但我们却不能否定其文学的历史客观性。两者并重的方法虽然在书写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必须基于历史事实,伦理阐释也随之受限,《旧黄书》里没有记载的就无法得到发挥,比如,双方当事人婚前依据什么样的婚姻标准包括道德因素走到一起,谋杀案发生后依据哪些相关方的道德标准审案,他们的道德立场和价值判断又是怎样使得此案如此了结?这些在历史资料中没有记载的就无从知晓。然而,轻客观史实的方法不同了,它可以弥补并重客观史实和主观因素的方法在创作中的局限,通过想象,没有的事实可以虚构,事件之间没有

的关联可以连,无法描述的伦理现场也可抵达,再加之与案件产生、发展和结果大体一致,正常的思维和认知逻辑的连贯作用,就避免了情节发展可能出现的简单、生硬和牵强,多方位叙述事件更可以互为补充,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现场和伦理现场,将主观的东西更进一步变为看似客观的东西,以提升文学的历史客观性。后文涉及用轻客观史实的方法创作出来的叙述者,其叙述形成了当事人伦理主线之外的其它相关伦理线,其结点与伦理主线上的结点相通、相交、相辅,比较完整地创建了案件的伦理现场和伦理网。

用轻客观史实的方法创作出的第一位叙述者就是半罗马。他的叙述与基陀的伦理线相通相辅,与蓬皮莉亚的伦理线及其辅助伦理线相交。首先,他认为基陀和蓬皮莉亚的不幸婚姻是康莫帕莱尼夫妇(特别是维欧朗特)一手造成的。维欧朗特在生子无望的年龄续了香火,这是把别人当白痴(B2: 213-230),后又拿蓬皮莉亚作鱼饵,让贵族基陀一口吞下(B2: 342-343)。虽然康莫帕莱尼先生对嫁女儿事先一无所知,但他得知后也只是假装大怒(B2: 382-384)。女儿婚后,老两口随女儿到亲家,没了以前的舒适生活(B2: 477-484),受不了亲家母无礼的对待与把持家政,无法让女儿的小叔子改掉过时的生活习惯(B2: 486-497)。于是离开阿热丛回罗马(B2: 504-525),老两口的忏悔公开了蓬皮莉亚不是他们女儿的秘密。无女儿就无嫁妆,基陀的索要落空(B2: 593-597)。所以,半罗马认为,维欧朗特尸体(包括脸部)被刺那是她自找的,而他丈夫脸部完好,他只是胁从(B2: 34-37)。此外,半罗马还对基陀的杀人的正当性作了补充:他绘声绘色地描述卡蓬萨奇与蓬皮莉亚调情(B2: 801-804),用海伦来比喻蓬皮莉亚,把卡蓬萨奇描绘成帕里斯<sup>[1]</sup>(B2: 1002-1009);半罗马身临其境地感受基陀的愤怒,当听到蓬皮莉亚生子,基陀怒火中烧,这究竟是自己的子嗣,还是卡蓬萨奇的野种,如果野种是自己的合法继承人,别人怎么说,魔鬼怎么说,上帝怎么说?基陀的大脑迸发出愤怒的火焰(B2: 1383-1390)。

另一创造出的叙述者是另半罗马。他的叙述与蓬皮莉亚的伦理线相通相辅,与基陀主伦理线、辅助伦理线以及半罗马的伦理线相交。他认为不幸婚姻的责任在基陀。康莫帕莱尼夫妇续个香火,人之常情(B3: 177-178),有个孩子,继承财产,没伤害到他人(B3: 163-164; B3: 193-200)。求婚完全是基陀委托帕罗(Paolo)住持所为(B3: 249-259);基陀以贵族头衔为诱饵,以嫁妆的方式攫取康莫帕莱尼夫妇的财产(B3: 353-357),维欧朗特向上帝忏悔,有了回报,教会判基陀物归原主(B3: 583-599),但法院却认定,蓬皮莉亚是低能儿,康莫帕莱尼放弃女儿无效,嫁妆还归基陀所有(B3: 670-676)。基陀心生毒计,伪造蓬皮莉亚的信,捏造她的父母令她即刻找个情夫,共谋掠财、烧房、下毒之事,得手回到罗马,分得赃物(B3: 738-750),驱使蓬皮莉亚陷入他设好的囚笼,其它出口都给堵上,唯独留下一个诱捕卡蓬萨奇的出口(B3: 772-787)。蓬皮莉亚只能走基陀为她设计好的出口,“所有出口就是这样被封死,/最终她只好选择那开的出口,/站在那儿/抬起苍白的脸看上帝在哪儿等她,/而她看到的却是卡蓬萨奇,/也在等待万丈悬崖上异宝奇珍(B3: 1039-1043),于是就看到了晚上他们向罗马奔逃,被赶来的基陀一伙逮了个正着的一幕。叙述人还补充了基陀的杀人动机,杀了康莫帕莱尼夫妇和蓬皮莉亚,丢下的小孩就会继承死者的所有财产,小孩的监护人是基陀,这样他就得偿所愿了(B3: 1546-1565)。

教皇(The Pope)担任叙述者提供了一条重要的伦理标准线,对当事双方的伦理诉求作最终的道德裁判。教皇的道德评判标准就是教皇之职。他要严惩罪犯,决不让罪犯逍遥法外(B10: 190-192)。处理案件时,他不仅凭借丰富的知识和人生阅历,而且尽可能地扩大视野,寻找证据,使判决公正。仔

[1]希腊神话故事中,帕里斯色胆包天,将海伦掳走,引发特洛伊战争。

细研读案卷,他感到了世俗的悲哀:“在这阴沉冬日,/我心灵的隆冬过于这世间的寒冷,/阅读这些最令人感到凄凉的卷宗。”(BX: 211-213)比对自己的道德标准,教皇的天平完全倾向控方,发现基陀的阴险狡诈。教皇认为,基陀乔装爱情,撒谎,杜撰情书,诬陷蓬皮莉亚;他与教会藕断丝连,声称任过神职,就是想作为俗人如果犯法遭法办,也能得到教会的庇护而免受惩戒(B10:436-442),“这样的人最没有宗教信仰,/是教会的蛀虫”(B10:452-453),他只相信他那低俗肮脏的欲望(B10:511):“金钱是他的一切:金钱,/唉,驱使他撒谎、抢劫甚至杀戮。”(B10:542-543)

教皇认为,上帝对基陀总是仁慈,然他总是领悟不到。法律的介入,隔离了蓬皮莉亚和基陀,暂停了压迫者的压迫,迟缓了受压者的受压(B10:704-708),而他却蛰伏起来,将牙齿锉得锋利,伺机还要狠咬一口(B10:727-731)。有了儿子,他应感激涕零,然而,他视之为钱袋子,干那最恶毒的事(B10:751-773)。之后,没头没脑狂奔数里,是上帝洪恩让他们脚痛身乏,悬崖勒马,否则就会落下万丈深渊(B10:845-859)。没有兑现承诺付钱,他的同伙们准备杀死他(B10:845-862),但警察在他们下手之前逮捕了他们。即使这时,他还有忏悔的机会,然而他不珍惜,撒谎狡辩。

其他相关人物也令教皇伤心。基陀的母亲就是个母夜叉,生了三个畸形儿,是个没有慈爱的母亲,没有温柔的女人,她让母爱蒙羞,让女性受辱(B10:911-914)。那四个同案犯,就像葡萄园挖地的帮工,不问在哪里、怎么、为什么干,不问被杀之人姓名,只要给钱就立马答应(B10:939-945)。教皇痛惜大主教这位牧羊人,对蓬皮莉亚这头羔羊在狼逼近时的求救莫动于衷(B10:985-990),责备总督对待蓬皮莉亚的冤情只是耸耸肩(B10:977-978)。令教皇欣慰的是蓬皮莉亚纯洁,经受考验,以德报怨,有道德情操,怎么赞美都不过分(B10:1019-1034)。卡蓬萨奇一听到求救的呻吟,就像角斗士立刻纵身跃进格斗场,拼死相救(B10:1138-1142),而“基督徒们这儿做了什么呢? /穿着洁白无瑕的僧袍”(B10:1451-1452),考验到来的时候,阿热丛市的大主教把前来求救的羊羔又送进狼口(B10:1453-1465),老修士极力推诿(B10:1470-1484)。而修道院声称对于修道院帮助过的人(指蓬皮莉亚曾在修道院寄宿过),当被证明不诚实,修道院有权接管她的财产,她们要吃掉她的财物,还假装是菲斯克律师的提议(B10:1510-1517)。教会士兵们在掷色子赌赢主的衣物(B10:1525)。难道这些就是自己管理的成果,是主为人类献身的第17个世纪之时(人类对他)的回报吗(B10:1531-1534)?这些都令教皇十分痛心,面对这个案子争执不下、各说一词的局面,他要撇开世俗的偏见,努力使自己的判断符合绝对的价值标准,而不是根据政治观点和个人好恶,签署法令,斩杀基陀及其同伙。

至此,我们清楚理解文学的历史客观性要借助于历史客观性,这是因为后者不仅为前者提供了基础和必要条件,而且还提供了方法论支持。通过借鉴历史客观性的三种态度和方法,有助于提升文学的历史客观性,为伦理阐释创造必要条件。《指》的多角度叙述同一案件就是合理兼顾这三种方法:重客观史实的方法提供故事轮廓、主伦理线和伦理结、一个大致的时代伦理现场;客观史实和主观因素并重的方法提供故事主要情节、伦理辅助线和伦理结,故事的伦理现场由此被展开;轻客观史实的方法完善故事细节,全面展开展示各条伦理线、伦理结,至此,文学的真实和虚构共同呈现了完好的伦理阐释条件和效果。

[责任编辑:平 啸]